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学术小结^①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5)03-0060-04

●王铭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E

感谢论坛主办单位,尤其是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老师的邀请。抱歉!我几场会没有来,对会议论文了解得不是很完整,主要责任在我自己。我曾在安溪调研,结识了一些朋友,这几天来来往往耽误了时间,失去了听会的机会,但是我利用这个时间把各位的文章翻阅了一遍,学习到很多。

我觉得这次是闽南文化研究领域上一次隆重的活动。我们邀请了来自厦漳泉的学者,厦门19个人,漳州7个人,泉州7个人。学者之间可能有些竞争关系吧,但是这次能够聚集一堂,畅所欲言。另外,省内省外请了二十几个人,港台有20个人,海外包括新、马、泰、菲律宾、韩国总共有9个人,可谓是一次盛大的国际性会议。

我们的讨论主题,就我个人的理解,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与会学者在这三个方面通过讨论获得了重要认识。

第一,闽南文化的内涵和它的传播。无论是两岸学者的论文还是来自东南亚的学者的论文,都涉及这个问题,到底闽南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是怎么传出去的?

^①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于2015年4月在厦门海沧举行。本文是会议的学术小结,由会议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

第二,闽南地区对外交流的历史遗迹。很多论文涉及这个方面。方言是一个关键,信仰仪式大家也看到很多,闽南对外交流的史迹大家也是长期有关注。

第三,海外闽南人的活动历史。这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东南亚、韩国等地的海外学者,他们重点在研究海外的闽南人和闽南文化。海外的闽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闽南文化像寺庙、方言等是怎么跟当地的语言进行融合的?他们的文化认同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些学术性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

另外,这次会议在政策研究上也提出很多很重要的观点,这些重要的观点都涉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设想。我对这个政策跟踪得不是很紧密,但是印象中,前面一段的“一带一路”指的可能是一条西安往西走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广西和云南连接东盟的这条路。这次会议包括以前我们闽南地区召开的一些会议,我认为是补充了“一带一路”,把丝绸之路恢复到它的原貌,因为丝绸之路跟闽南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可能更为密切。与会学者探讨了闽南人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在21世纪新的发展中有什么新的机遇,海内外的闽南人应该怎么样联手把这些事情做得对大家更为有利、更为双赢。

这次会,我得到的启发很多。

刚才几位学者还谈到了智库建设,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大家畅所欲言。支平老师是我们厦大的,我也是厦大毕业的,他说的简短的那句话也是我想说的。他比我有本事得多,我没本事,不过大家如果需要我来参与的话,我极端乐意。

刚刚我是在说我观察到我们这次会是在干什么,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以下我谈谈通过听会得到的体会。

我通过这次听会,对某些方面的课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我将这些认识提出来,与在座各位来自各地的专家共同关注。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对未来我们的讨论有所提高,或者说,会不会对我们未来讨论的多样化有帮助,但我还是先提出来。

第一,通过阅读大家的文章,我想到了闽南这个地方的学术价值。我认为,闽南提供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进行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的最好园地。闽南这些地方,这些小小的地方的小小的内容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活跃地牵扯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要研究闽南,除了宏观把握,还要微观和宏观紧密联系,注重对日常生活的考察,注重从地方入手进入世界。我觉得我们的会议论文还需要再进一步更有意识地去结合微观的方法和宏观的方法。尽管有些论文在微观上说得很好,有些论文在宏观上说得很好,但是这个结合似乎还有更大空间。

第二,对我而言,闽南文化有一种双重性格,这个说法不一定对,我是斗胆提出来让大家“骂”的。什么是“双重性格”?就是说我们有封闭和开放的两面。闽南文化有着双重性,一方面我们这里的人和文化的文化似乎很保守,另一方面这种保守和自我意识并没有妨碍我们这里的人和文化的对外开放。这对外人来说好像是一种分裂和矛盾的双重人格,但实际上它自身蕴含着一个人值得我们思索的重要文化理论。所有的文化都必须在封闭和开放之间求得一种平衡,而闽南文化的研究表明,这种平衡是可能的。我们未来可以在这个方面通过政策研究,通过经验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研究都可以多做点工作,这不仅是对中国有启发,对世界也有启发。以前的理论都是把封闭和开放看作对立的,很多社会科学的论述似乎在告诉我们一种伪知识,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但是我们闽南的很多历史中的实践表明,这两

个东西向来是并存的。很多社会学的专家写论文,都在写以前人怎么封闭,改革后怎么开放。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闽南的历史经验表明生活更为复杂。

第三,我觉得有必要去深入地探究闽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及世界诸文明当中的地位,只有这个才能真正地说明闽南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闽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地位是极高的。民国期间有一个经济史学家叫冀朝鼎,写过一本著作,阐明唐中叶以后中华文明中心南移的历史轨迹。而南移的中心,包含着很多亚中心、次中心,其中有一个肯定跟闽南有关。我们是在中原动荡的一些阶段迁徙到闽南地区的,然后跟当地的原住民有冲突、有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闽南文化这个复合体。在闽南文化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明远古的状态。举一个例子说,19世纪有一个荷兰的人类学家在厦门住了半年,研究闽南的风俗习惯,他写了几千万字的著作表明闽南文化当中留存着许多周礼的制度。这怎么可能?原因可能是“五胡乱华”,中原的文化变化比较快,文明的留存比较困难,但在南方情形不同,正是在文明的南方新居所,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变迁相对缓慢,古文明的保留相对更为完整。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总是跟学生说,中国人类学最好的田野园地在闽南,因为在闽南可以完整地体会到历史是怎样的、传统是怎样的、变化和不变化的关系是怎样的。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闽南的人类学家在中国人中是最多的,林惠祥、李亦园、陈国强、蒋炳钊等一大批著名中国人类学家,都是在闽南诞生的,他们对古史、对文化有感觉,做的学问不一般。关于我提到的闽南文化在世界诸文明中的地位问题,我认为,其所以这么提,还是与闽南的历史有关。闽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心南迁以后融合成形的。作为中华文明在南方的中心之地,在唐中叶以后,这个文化频繁地与境外的各种文明交汇(不仅与土著文明),它跟这些文明产生过很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表明,闽南文化内有世界性的内涵,而我认为,闽南与域外诸文明的关系是个世界性现象。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施坚雅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泉州、漳州(和宁波)和厦门代表着中国东南沿海历史的三个步骤,泉州最早成为宋元经济中心,接着是漳州,到了近代,由于通商口岸的原因到了厦门,给闽南地区带来了更多近代文化特征。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不过它已经表明,就整体来看,起码从唐中叶以后,闽南就摆脱不了与域外文明的关系,它的经济文化中心的移动规律,充分显示着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很有说明意义,说明闽南这个文化类型在世界文明、中国文明中有着特殊地位,是海内与海外的中间枢纽。

我在厦大硕士毕业之后去英国读博,花了很长时间作闽南地区的调查研究,试图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对闽南文化有所说明。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闽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现有的所有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的,闽南地区的现代化似乎跟其传统的复兴不矛盾,我们的现代化可以说表现为传统的复兴。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说,闽南的经验调查如果通过新一代的学者进一步地综合,可能在社会科学理论上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会是什么?我的想象是,我们闽南的现代化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颠覆,现代化恰恰是不同的传统的未来。闽南的现代化就是过去的闽南的诸地方传统找到了一个现代的未来,社会科学应该据闽南的经验对自己进行更深刻的反思。我想不管我们搞不搞智库,这个意义都很重大,因为20世纪中国长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外来的,但有些是由于我们内在接受了断裂的历史解释。我们的智库如果能够通过对闽南经验的把握研究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是比说一些空洞的话还要重要的。



最后一点,假如这次会议能够有更多研究历史上中国和国外的学者、本地和外地的学者是如何研究闽南的这样一个专题讨论,那么,对于我们研究闽南文化的水平的提高,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这次这类文章太少,只有一两篇。我们知道前人研究过什么,比如,知道我刚才举例的18世纪在闽南呆了八年的荷兰学者做了许多很深刻的研究工作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海外闽南研究有持续的进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奈尔大学还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的研究计划,以台湾为田野点的,透视中国文化,这个计划出了很多很优秀的成果。这批成果是通过台湾怎么样看到闽南,又是通过闽南怎么样看到中华文明的,这样的历程我们是需要去了解的。国内的闽南研究也有过高人,从清末以来,现代的学问开始萌生,在闽南地区各城市出现了一批民俗学家,其中就有我老家的吴藻汀先生,还有考古学家,像吴文良先生和庄为玠先生,也出现了新方志学、中西交通史等等学问。20世纪20年代,有一批大师来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工作,如顾颉刚、张星烺等等,在闽南都有重要的学术活动,他们的论述很值得我们去重新阅读和理解。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前辈留下的闽南文化研究学术遗产如果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话,我们的学术发展就很困难。

我是个在外地工作的闽南孩子,跟大家一样,对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北大讲课还操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而且经常感到自豪。我以上谈到一些参会学习体会,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

[收稿日期]2015-06-17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Whose Flute, Song, Dance and Drum?: The Music of Bei People in Dangchang, Longnan,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Discourse of Ethnic Group

Chen Pan

Abstract: There lived a group of people calling themselves “Bei” in Dangchang, Longnan, Gansu Province. For a long time, they think they are Tibetan because the pronunciation of Bei is very similar to “Bod”, the self-claim of Tibet. Bu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ibetan in other areas in terms of language, dress and customs. Recently, some local intellectuals argued that they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ncient Di and Qiang according to old documents, which idea is supported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to develop tourism. It is the ethnic alternation caused debates 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among villagers,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various ages and the changes of Bei’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usic. Based on the fieldwork about Bei’s existing music,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such issues as how the Bei’s music has been changed and how Bei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music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ethnic identity.

Key words: Bei people in Dangchang; ethnic alternati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sic (see P. 131)